

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

——怀念三位已故学友

○周锦荪（1945物理）

年纪大了，一个突出的感觉是“故人凋零”，不断会得到亲友去世的消息。一年几个，累积起来也就可观了。最近看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日本小说，是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学生的友谊和爱情生活的，其中有些男女青年厌世自杀，所以小说的扉页上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我看到这句话很受触动。

当年在叙永分校，开学后新生们很快就“人以群分”，形成大大小小的集体。我参与的那个被称为“一个老头带三个小孩”，老头是数学系的张信达，比我们要大七八岁，是从抗日前线回来上学的共产党员，因为曾经被捕，失去了组织联系。小孩是物理系的茅于宽、化学系的卢锡锬，以及电机系的我，都是18岁左右。我们都是江浙人，都讲南方普通话。张信达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我同卢锡锬是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但在中学不同班，进了联大才熟悉起来；茅于宽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子，什么学校毕业的记不清了。

张信达为人和蔼，常给我们讲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天津学校里如何组织“吃苦团”，天天洗冷水澡锻炼身体，组织外出露营，准备迎接艰苦斗争的考验，得到校长张伯苓的表扬。后来他还参加过绥远抗日战争，更多的他就不肯说了。其实他后

来是共青团中央的比较负责的干部，在浙江老家领导过一个前线抗日宣传队，不幸被捕，以致脱党。到叙永后，他仍天天下永宁河洗冷水浴。我也跟他去洗过两次，因为是腊月天气，未能坚持下来；但因此看到他健壮的身体和发达的肌肉，歆羡不已。他还带来整整一木箱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和英文版的报纸《莫斯科新闻》，我可以随时借读，因此，他成为我最早的启蒙者之一，我们在叙永一同参加秘密读书小组。而他本人，虽然最初仍保持革命热情，但渐渐就专心于数学研究，比较地脱离政治了。

茅于宽个子稍高，圆圆的脸常常侧着，让软软的头发垂到眉际。他爱写诗，影响我也学着写诗。他同张信达都是《流火》壁报的撰稿人。他可能患有心动过速症，有经常检查脉搏的习惯，常常按着脉搏，眉头一皱，叹息着说：“咳，又快了！”这一形象，至今我还历历在目。但他这病后来好象并没有发展。

卢锡锬个头最小，又有一张比较稚气的脸，从中学起大家就叫他“小家伙”，这可能影响他有点自卑，比较沉默寡言，只是埋头读书，学习成绩很好。有一次闲谈中谈起小说《三国》、《水浒》，才发现他对这些闲书也很熟，成为我们经常的谈资。他也比较关心政治，只是没有言行

□ 师友情

表现而已。

二年级我们到了昆明。他们三人住进新校舍26栋，仍然保持亲密联系，住在同一个小单元里；我则住在拓东路工学院，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到大西门同他们见面。每次见面，张信达总要向我盛赞联大的学术气氛，把一些学术讲座的内容向我作介绍，使我更感到工学院课程的枯燥乏味。下一年我就决心转学，来物理系重读二年级，恢复了原来“一老三小”的格局，住在26栋同一个单元，我同茅于宽在上铺，下铺是卢锡锟和张信达，可以一起听讲座，上茶馆，听音乐，看电影。那时，张信达在外面中学兼课教数学，有点收入，上茶馆经常是他来付钱。

可是，那是我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时期，我单独参加另外的地下读书小组，有了更多的学友交往。另外，他们三人都很重视睡午觉，晚上也比较早就上床休息，我却觉得这是在浪费青春年华，总是想另外找事做，比如读雨果的诗，或者抄歌谱。有几次，他们都已上床入睡，晚上11点钟左右，我会一个人走出校门，在门前的公路上快步疾走，享受黑暗中迎面吹来的晚风，消耗我身上残余的体力，再摸回去睡觉。其结果呢，第二天大家都起床了我还在睡懒觉，不仅误了早点，连上课都几乎迟到。

到了1943年的冬天，国民党政府下令征调全国1944级的大学男生入伍，担任来华美军的翻译。他们三人都在征调之列，我因为转入了1945级，得以幸免。对于此事，进步学生多数是打算抵制的，原因是出于对国民党军政当局的不信任。茅于宽就干脆离校下乡教书去了，张信达却欣然

从命，卢锡锟也无奈地接受了。后来，他们两人始终还在一起，分配到印度的为中国远征军设立的美军医院当翻译，过着相对平静的日子，直到战争胜利的1945年夏回到昆明。他们从印度带回来许多派克金笔，分送给大家。随后，我下乡教书，他们北上，我们“一老三小”的日子就永远退隐到温馨的回忆中去了。

从那时起，又逝去了多少不同命运的岁月呵！我因为在云南参加地下革命斗争，始终留在云南，而且长期在矿山工作。茅于宽去了美国留学，成为无线电天线专家，一直在西安的电讯学院工作，是我们四人中生活得最平静的一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国后给我的第一封信，就附来了我在学生时代的两篇诗稿，他居然长期为我保留着，友情可感！改革开放以后，我落实政策回到了昆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远在美国的母亲在姐姐陪同下来昆明看我，我的海外关系从沉重的包袱变成令人羡慕的“财富”。我送母亲到北京上飞机回美国，归途到了西安，就住在茅于宽家里。他比以前胖了，他的妻子是位医生，生活上对他照料得很好，他的女儿领我们看大雁塔和碑林。后来他同夫人来昆明旅游，也住在我的家里，只是他已经不写诗了。他大约在十年前安静去世。

另外两位的命运就不同了。张信达长期在东北农学院当数学教授，1956年被划成右派。听他后来说，“大鸣大放”开始后，许多对学校有意见的同事都来找他，说还是你来替我们说话吧，你是老革命，说话有分量。结果他就成了右派，恢复不久的党籍又丢了，所幸没有停止他的教职，对他的处理还是比较宽大的。卢锡

锷是北大化学系的教授，1955年我从东川矿务局出差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同他见面，他好像不太得志。他说他成了苏联专家的陪衬（原话不一定如此），苏联专家比较主观，学术体系又同欧美有差异，教学有不少困难。他从来胆小怕事，我也找不出话来安慰他。不料11年后，“文革”开始，北大学生造反，他是第一批受冲击的，罪名就是当过美军翻译。他不知所措，当天晚上就投进未名湖自尽了。更有甚者，第二天，他同样胆小怕事的夫人也踏着他的足迹走上同样的不归路，丢下两个幼小的女儿流落在北大。1979年我在北京时，刚好张信达也在北京，我们一同到北大寻访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还好，姐姐已经被安排到化学系的实验室工作，妹妹则安排上了学。我们同她们见了面，竟找不到话语来安慰她们，张信达还对付了几

句，便一同告别回来了。这也是我俩的最后一次会面。

张信达的晚景还不错。1979年那次南行，他从北京继续南下，见到不少当年的老战友。其中有的已经是省一级的领导，受到他们很好的款待。他在东北的夫人先他去世，他又同过去在上海的一位战友结成了晚年伴侣，我曾写诗表示祝贺。从此他有了东北和上海两个家，享受愉快的晚年，直到去世。

“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行年90，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亲友，该有多少祭日值得纪念啊！而具体的，我又记不起来几个。上面所写三位，我就一个也不知道他们的忌日。但同他们的友谊构成我联大生活的重要部分，是我一直历历在目的。谨记如上，以供所有健在的学友参考。

2011年9月17日

他为地质事业奉献一生

——追忆曹添

○谭钰贞（1952地学）

曹添，1926年生于江苏南通石港，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他的父亲教过书，办过报（最早的《南通时报》）也办过慈幼院。曹添自小受父亲教导，加之聪颖好学，因此从小便是拔尖的好学生。1935年曾被评为模范家庭中的模范儿童。

1938年日寇侵略到石港，疯狂烧杀抢掠把他家一把大火烧光。他父亲正患病，气愤之下病重而亡。在家破人亡极端痛苦

的情况下，12岁的曹添和家人掩埋了父亲，和母亲一起来到了上海。当时他大姐已从上海美专毕业，在印染厂搞美术设计工作。由于家庭环境的巨变，他母亲病倒了，他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吐了血，因此休学。一年后再考入上海中学，他很珍惜这段学习时间。在上中六年学习中，他对文理科都有广泛兴趣，高中分文理科时他想到科学救国，因此选到理科，但他对文科